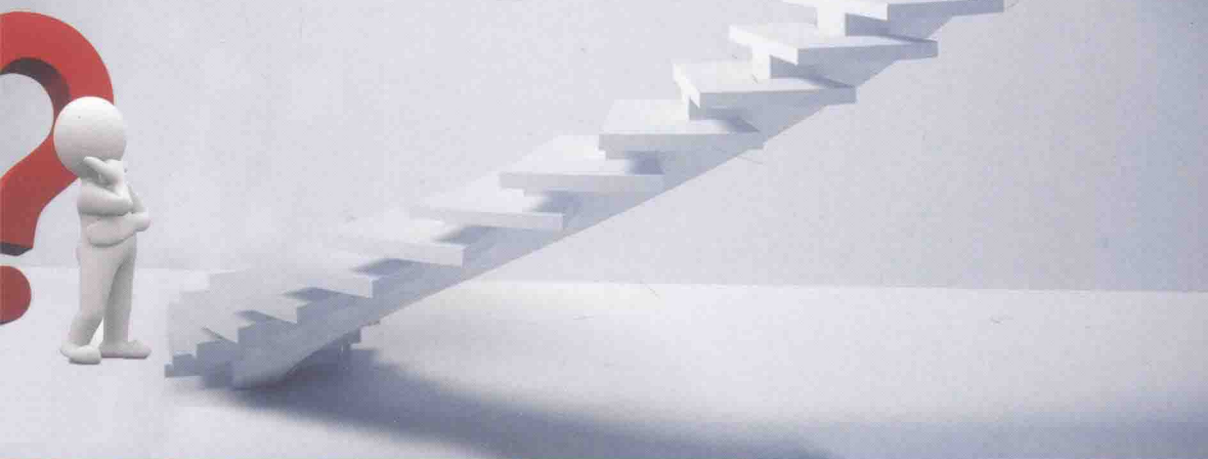


改革：困境与出路



郑永年 莫道明 刘骥 / 主编

改革：困境与出路

郑永年 莫道明 刘骥 / 主编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改革：困境与出路 / 郑永年，莫道明，刘骥主编. —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7
(IPP文库)

ISBN 978-7-5060-8350-8

I .①改… II.①郑… ②刘… III.①政策科学—研究—中国 IV.①D60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71964号

改革：困境与出路

(GAIGE: KUNJING YU CHULU)

主 编：郑永年 莫道明 刘 骥

责任编辑：栗河冰

出 版：东方出版社

发 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100706

印 刷：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5年9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3 000册

开 本：710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19.75

字 数：225千字

书 号：ISBN 978-7-5060-8350-8

定 价：58.00元

发行电话：(010) 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电话：(010) 64258029

中国的公共政策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历程。在东亚的政治与文化环境中，中国政府在国家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学界所说的“发展型国家”的作用。中国的体制改革和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公共政策得以实现。或者说，公共政策一直是推进国家各方面变革的主要动力。公共政策作为经济社会变迁的媒介涉及另外两个重要因素，即思想创新和制度建设。公共政策首先是思想创新的产物。如果没有思想上的创新，公共政策便没有可能性。思想的创新促成了公共政策的产生。再者，公共政策也必须以制度建设为依据，或者说制度建设是公共政策最终的归宿。公共政策如果最终没有落实到制度建设的层面，就只会表现在社会或政治动员中，公共政策所带来的变化和所取得的成果就很难巩固下来。因此，必须在思想创新和制度建设的框架内来检验公共政策的演变与结果。

同时，公共政策发生在一系列的背景环境中，主要包括市场、社会和文化环境。如果前面所说的思想与制度主要表现为主观要素，那么市场、社会和文化等因素主要表现为客观要素。因此，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也是一个和市场、社会 and 文化的互动过程。检验公共政策也就要看政府如何与市场、社会和文化互动。

在公共政策制定和公共政策与环境互动两个层面，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已经形成了其独特的公共政策模式。这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不少教训，需要我们进行客观理性的总结。另外，中国的公共政策并不是在封闭情况下进行的；相反，公共政策是在“开放”或者全球化的状态下展开的，吸收了他国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因此，中国公共政策模式的研究和总结不仅有益于国家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对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有借鉴意义。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于2014年在广州召开了以“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公共政策：回顾与展望”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大会由IPP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担任会议主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汉斯·道维勒（Hans d'Orville）受邀参会致欢迎词。研讨会邀请了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柏思德（Kjeld Erik Brodsgaard）教授、波士顿大学政治系的博士卓（Joseph Fewsmith）教授、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Barry J. Naughton 教授、爱荷华大学政治学系唐文方教授、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黄佩华（Christine Wong）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赵力涛博士、单伟博士、全月婷博士、钱继伟博士、光磊教授，还有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许成钢教授以及来自中国大陆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张千帆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静教授等会同IPP的各专家学者，集中探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公共政策发展的历史和重点问题，国际国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公共政策模式，以及中国未来公共政策发展和变迁可能的方向以及政策建议。本论文集对发言学者的优秀论文进行了汇总，既有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公共政策所做的理论界定与分析，也有实践层面的整理和评估，既对国内公共政策进行了集中谈论，也加入了国际视野的比较，针对中国改革开放背景下的政策变迁提出了诸多值得深入的问题。

郑永年教授在会议的开场演讲中提出的问题是，“中国的社会经济在

过去三十年间既然已经发生了如此急剧的变化，为什么中国的政治体制还能屹立不倒”？通过题为《中国的政治创新试验及其世界意义》的主题演讲，郑永年教授试图回答中国政治体制的本质是什么，它是怎么运作的？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为何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存能力？通过详实的分析，郑永年提出，作为一个“学习型国家”，中国在改革其政治制度方面都相当具有创新性。同时他认为，我们不能不给中国探索自身政治道路的权力，这不仅对中国自身有好处，对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尤其是对发展中世界。在发达西方和发展中世界都出现了民主危机的时代，中国制度经验的意义尤其重要。其经验可能会给其他国家提供有益启示。郑永年还在最后提出，我们不必将中国的经验理解成一种削弱其他地区政治体制的企图。如前文提到的，中国既学习了西方政治体系最好的经验，也学习了它的教训，并将它们与自己的传统相结合。这种学习与适应的主要驱动力在于，中国有着设计一套能让自身适应环境变化的政治实体的需要。这才是中国政治创新的根本目标，中国并不是试图要改变世界。

接下来的议程对思想解放与改革话语变迁进行了回顾与展望。许成钢教授的《产权、私法和宪法：改革面对的不可避免的关键问题》一文提出，深入了解今日改革困局的基本渊源，即产权、私法和宪法方面存在的基本问题，是避免改革重蹈历史变法失败之覆辙的基础。中国自古没有独立于皇权的私有土地产权，从来没有绝对私有产权的概念；从来没有私法的概念体系，只有公法中的刑法和行政法。这是中国自古没有宪法和宪治的基本原因。私法是宪法的基础。而私法的社会基础是私有产权和公民权利。中国直到1906年才在庚子战败的外界压力背景下，开天辟地建立第一部私法。但私法从未在中国奠定基础。在此背景下，1949—1986年之间，中国更彻底取消了私法的核心。直到经济改革的推动，于1986年，中国才重建《民法通则》。但其中私有产权概念并不清晰，与宪法治理法治环境中基于私有产权的民法仍有基本差别。2004年的宪法修订在承认私

有产权方面虽有进步，私法的缺失仍然直接阻碍中国在土地制度、城乡制度、金融制度、银行体系、民营经济的改革。这同时关系到腐败的根源、不平等的根源等一系列基本问题。

在政治与法律领域的政策方面，张千帆教授的文章对中国司法改革的路径与困局进行了深入分析。张千帆教授提出，很长时间以来，诸多因素一直困扰着中国的各级法院。政治干预破坏了司法公正和独立，业务素质优良的法官极为稀缺；更普遍的是，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行政国家，传统上无足轻重的司法权尚未得到社会应有的尊重。现行司法体制因无法保持中立而不能满足市场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因为只有保持政治中立才能巩固在市场交易中形成的经济秩序。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各地的情况和地方利益存在巨大差异，各级法院和当地政府之间联系紧密，这些因素也损害了法治统一。改革现行司法体制的紧迫性已无须论证，但是具备政治可行性的改革思路尚不清晰。张千帆教授分析了中国司法存在的各种问题及现行的解决方案，提出了分析司法体制所需要的理论模式，对造成中国司法综合症的若干因素进行分类，并介绍了治疗这种综合症的现行解决方案，最后简要讨论了这些解决方案可能产生的实际效果并展望司法改革的未来方向。

朱旭峰教授关注了市场导向的行政审批制度在中国城市间的扩散。行政审批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肩负着调节政府与市场间关系的职能。1997年，全国第一个城市行政服务中心的建立揭开了市场导向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序幕。短短十多年间，中国268个地级或副省级城市建立行政服务中心。如此巨大的制度创新和组织扩散过程是如何发生的？朱旭峰教授研究了中国背景下的城市行政审批制度的创新扩散过程，进而总结了城市行政审批制度的创新扩散的经验，致力于支持各级政府更科学地推动下一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在经济政策领域，Barry J. Naughton教授对中国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

业政策进行了回顾与展望。Naughton 教授提出国企改革可以分为若干阶段，在这些阶段，激励问题、政策目标、政策限制、主要的话语或利益集团都发生着一定的变化。对这些实质性的子阶段进行初步调查研究可能揭示出四个连续的时期，每个时期都有针对国有企业问题的主流词汇和方法。令人惊讶的是，主流词汇中从未包含“私有化”。从字面上讲，私有化从来没有正式被提上日程，因为意识形态共识从未扩展至公开的私有化。然而，多年来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私有化。对国有企业问题可以尝试性地划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政策制定者都面临一个主导目标：1978—1992 年是如何放开国有企业，并给予他们更好的激励；1993—2002 年是如何精简国有企业，将社会和国家从不必要的负担状况中释放，怎样才能使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和市场环境更加合理；2003—2012 年是怎样才能创建一个更强大，更高效，更集中的国有企业部门；2013 至今则是怎样才能创建一个不扭曲经济激励或延迟经济转型却能对公共产品和维持公共财富做出贡献的国有企业。每个阶段对应于不同的政治结构、不同的政治领导艺术和非常不同的结果。Barry J. Naughton 教授在对每个时期进行了梳理，但他认为未来仍然是非常不确定的，是否会有新一轮的企业改革以及会发生什么变化还有待持续观察和研究。

柏思德教授观察到了中国超级经理人的崛起，他提出，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的超级经理人是产生在国有部门中的，那里集中了中国最大型企业。柏思德教授认为，中国的商业团体已经演变成为大型、多元化的企业，并拥有重大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他们已经能够积累庞大的财政资源，并产生巨大的利润，且这些利润被留在了团体内部。管控这些商业团体的管理精英享受副部级待遇，这一级别通常高于本应管制他们行为的国家行政机关和部门。这些超级经理人也构建了一个阶层，政党国家可从中招揽越来越多的领导人才。事实上，商业精英只是“党管干部”系统的一部分，因此他们可以从一家公司的 CEO，转去另一家国企的类似职位，或

者从一位商业领袖，转变成国家机关或政党的一员，反之亦然。这就促进了精英群体中的社会和政治流动。它同时也催生了与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错位的，高度精英化、高度不平等的社会。

在社会领域的政策方面，赵力涛博士从“碎片化发展主义”的视角对中国的社会政策改革进行了分析。他提出，发展主义在东亚是一个有效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型，但是中国无法完全复制其东亚邻国的成功经验。中国的整体发展轨迹及其具体的社会政策改革使其更像是一个碎片式的发展主义而不是理想型的东亚发展主义。此外，中国无法依赖东亚发展主义得以持续的有利条件来弥补其社会政策的缺陷，这些有利条件包括充分就业、就业保障、年轻的人口以及强大的家庭。中国目前的福利制度是分为两部分的：一个是为政治上“最应得的人群”服务的特权部分；另一个是深度市场化的部分，即个人能享受的社会服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支付能力。未来中国社会政策改革的方向是要将这种二元制度改为一个更加一体化的、更加包容的制度。

单伟博士的论文以1993—2013年的四个针对中国公民的全国随机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尝试追踪了社区选举选民的社会人口学特征与政治态度变化。概括地说，积极参与中国社区选举的人们更可能受过良好的教育、政治效能感更高、更有反腐意识、对民主价值的倾向性更弱、不倾向于抗议并且对地方政府和自身生活满意度更高。文章还注意到2013年中国选民的行为模式与之前的年份截然不同。最突出的区别在于教育程度高的公民参与基层选举的可能性却更低了。选举对于那些政治能力较高的选民已经丧失了号召力。这些发现支持了传统政治参与对中国公民的重要性。积极参加投票和竞选活动的人们对政府和个人生活都更为满意。另一方面，放弃参与的人们更有可能采取抗议。中国选民去投票并不是为了追求民主理想，而是为了实用目的，这可能并不支持“基层选举是中国民主的第一步”的论点。

在全球化与中国公共政策变迁的议题上,王辉耀教授关注了海外人才对中国公共政策的影响。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社团是海外华侨华人在其所在国生存发展的过程中自发形成的民间组织,近些年由于新侨民和来自中国内地的留学生数量的不断增加,社团的成员以高层次知识分子、专业技术人士为主。侨务公共外交最早是我国侨务办公室于2011年提出的一个术语,指一国政府及其主管部门展开的一系列制度化沟通活动,主要针对的对象是海外华侨华人及归侨侨眷,在配合该国总体外交的基础上帮助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是我国公共外交中的关键环节。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社团凭借其特点和优势在我国侨务公共外交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王辉耀教授认为,我国应加强同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社团的联系,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其在我国侨务公共外交的工作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和影响力。

研讨会的最后一个主题是中国政府的治理能力,在这一议题上,陈玲副教授对中国政策过程研究的三大流派及其理论创新进行了梳理和评论。当代中国政策过程的研究呈现出三个相互交织的流派,亦即中国政策制定的三个演变特征:制度化、分权化和适应性治理。陈玲副教授廓清了三个流派的核心概念、主要观点和政策过程模型,并形成理论对话,以进一步探讨中国政策过程的研究方向和实践启发。(1)制度化学派将后改革时代中国政策过程的演进视为制度化的过程,研究关注决策中的组织机构、管理流程和价值规范的建立和演变,视决策者为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下的行动者,决策模式包括共识模式等。(2)分权化学派将此过程视为分散的权力/利益主体逐渐形成、相互博弈、并进一步强化分权的制度安排的过程,研究关注不同的权力和利益主体如地方政府、利益相关者甚至专家和公众等参与和影响决策的方式和特征,政策过程模式包括锦标赛竞争、央地博弈、倡议联盟等模式。(3)适应性治理则将后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政策过程的演进视为适应性治理的学习过程,研究关注政策学

习、政策创新和政策扩散，政策过程模式包括摸着石头过河、选择性执行等模型。文章指出，无论是制度化、分权化还是适应性治理，现有研究所揭示的演进方向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与政治学、发展经济学等学科的对话和规范性研究是当务之急。

张静教授的文章对周黎安提出的“行政发包制”何以成为中国的政府治理模式做出了解释，试图从行政治理机体本身的特性及历史关系来说明发包制的组织基础所在。文章提出，行政包干顺势于不言自明的控制权范围，通过默许、交换和隐形授权，将目标和利益不同的组织容纳一体，形成了今天治理体系中混合共生的形态。行政机体的组成结构、其内部真实的组织关系和多元角色，是发包制产生的基石。

钱继伟博士通过中国农村的扶贫案例讨论了公共政策与制度如何相互影响。文章回顾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农村扶贫计划的发展过程。政府发起的发展项目对经济发展有利，因为人们认为政府能够设计和执行发展策略，同时也能够协调不同责任者之间的合作。然而，在不同的环境下政策的效果也许是异质和不确定的。文章还讨论了政府对发展项目所产生后果的回应，以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项目是如何演进的。文章特别讨论了重庆城乡一体化的例子，它是政府通过处理二元经济下的制度约束，对降低农村贫困的一种新尝试。

傅士卓教授在会议中以《改革开放时期的一个（可能的）转折点》为题进行了主题演讲，改革开放的开端有许多方面，这篇演讲所关注的是组织上的转折点，即干部制度的改革。有学者认为中国在精英层面和行政层面的政治行为都变得制度化了，傅士卓教授对此并不认同，他批评学者们对于“制度化”这一术语并未审视其涵义便在著作中广泛使用。考察中国的干部系统，我们确实能够发觉与以前相比干部更年轻，受教育水平也更高，但并没有证据证明中国的行政体制正逐渐趋向韦伯式的科层制。傅士卓教授提出，“党管干部”的原则造成了三对紧张关系，包括层级控制和

共谋的需求，非人际关系化的要求和拉帮结派的需要，以及（对个人的和政治上的）忠诚的优先性和考绩。这些紧张关系使得干部体制不太可能随时间推移演化为韦伯式的科层制。

从这些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讨论的题目很不相同，但有两个基本的共同点：一是都是在努力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中国以往三十多年的公共政策进行梳理、界定、分析和评估，在试图总结出一些具有规律性的政策变迁模式。二是都看到了在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的冲击下，中国的公共政策正在面临新的挑战。中国需要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不断地学习世界各国的成功的经验，并对未知的领域，进行谨慎的探索。

本论文集的顺利出版有赖于多位同事的共同努力，首先要感谢为研讨会的召开付出大量心血的 IPP 行政工作人员林蓝、周盈、徐萍、王焱、陈洁芳、郑成志等；还要感谢担当英文论文的翻译与校对的各位 IPP 研究人员：刘骥、陈津津、谭锐、卢海阳、黄靖洋、史英男、德新健、翁翠芬，以及为译稿做最后把关的三位终校：祁冬涛、杨沐、杨丽君；更要感谢为本论文集出版提供多方面协助的东方出版社和该社的栗河冰老师。

最后，也请大家期待 IPP 第三届国际学术会议的召开以及会议论文集的出版。IPP 的第三届国际研讨会将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2015 年 8 月联合召开。这次会议的主题为新人本主义、治理与可持续发展。来自全球的专家学者、政府官员、联合国官员，以及其他政府间国际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将共聚一堂，讨论可持续发展、治理与新人本主义相关议题，为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探寻新的可行的发展模式。

2015 年 4 月

目录

Contents

- 00 序言 莫道明 刘 骥 001
- 01 郑永年
中国的政治创新试验及其世界意义 001
- 02 许成钢
宪法是市场经济的基石 015
- 03 唐文方
中国城市居民公共政策满意度调研 039
- 04 朱旭峰 张友浪
市场导向的行政审批制度在中国城市间的扩散 065
- 05 张千帆
中国司法改革的路径与困局 081
- 06 柏思德 (Kjeld Erik Brodsgaard)
改革时期国企高管的社会与政治流动：中国超级经理人的崛起 111
- 07 傅士卓 (Joseph Fewsmith)
改革开放时期的一个 (可能的) 转折点 127

08 赵力涛

中国的社会政策改革：“碎片式发展主义”的视角 **135**

09 单 伟 唐文方

中国选民：1993-2013 **159**

10 全月婷

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及政策变迁 **181**

11 张 静

为何是行政包干制？——政策执行的组织基础 **189**

12 钱继伟

中国农村扶贫策略的演进 **205**

13 陈 玲 杨文辉

制度化、分权化与适应性治理：中国政策过程研究的三大流派
及其理论创新（1990-2013） **229**

14 王辉耀 苗 绿

如何充分发挥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社团在中国侨务公共外交
中的作用 **263**

15 Barry Naughton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政策改革的回顾与展望 **281**

中国的政治创新试验及其世界意义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所长

“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创新型的吗？”我之所以将这个题目作为今天的演讲主题，是因为在中国对于世界各地人民的日常生活变得越来越重要的同时，这个国家似乎也成了一种我们从未见过的政治实体。中国领导人已经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中国想要制定一条不同于其他地方已有经验的政治路径。

促使我选择今天这个演讲题目的是我在今年二月和三月份读到的两篇文章。让我对这两篇文章做一下简单回顾。

第一篇文章刊登在《福布斯》杂志（2014年2月23日），作者是埃蒙·芬格尔顿（Eamonn Fingleton），文章的标题是《颠倒的宣传：中国如何愚弄了〈纽约时报〉、英国广播公司和其他一厢情愿之人》。根据作者的说法：

近二十年来，北京通过各种有意和无意的代理人（其中很多是西方人）说服美国和欧洲相信中国的崛起只是某种假象。北京正在利用西方那种看似没有止境的一厢情愿心理，对于那些一直相信这个故事的人，北京的动机很明显：助长他们的自满和拖延。关键在于，西方人对世界强国的版图已经发生了多么深刻的变化理解得越慢，他们任

何试图削弱北京野心的努力的效果就会越差。

作者引用了很多由诸如《纽约时报》、《经济学家》和《时代》等西方媒体做出的错误预测作为例子：“现在我们知道了，先前的预测不仅被证明是错的，而且与事实恰好相反。中国没有符合时宜地崩溃，而是继续以高于历史上任何其他主要国家的速度增长着。事实上，中国现在的实际经济规模已经超过了2003年时的3倍，几乎超过了1998年时的6倍。”

我不确定中国政府是不是在故意愚弄西方媒体。鉴于很多中国的媒体都常常惊讶于这个国家的迅猛发展，我可以确定的是，包括中国领导人在内，没有人能够预测中国的未来。但是芬格尔顿指出的一点是对的，先前所有那些关于中国经济体制灭亡的预测都被证明是言之过早了。

第二篇是发表在《经济学人》（2014年3月1—7日）上的一篇六页的文章，标题是《民主出了什么问题以及如何挽救》。这篇文章讨论了世界各地的民主现在正如何经历着一个困难时期。的确，民主正在败退。在西方以外的地区，民主的发展通常只是走向崩溃。“在独裁者们被赶下台的那些地方，他们的政敌几乎都没能建立可行的民主政体。即便是已经在西方建立起来的民主制中，体制的漏洞也明显得让人忧虑，当政治操纵大行其道时，民主的幻想也随之破灭。”（第47—48页）“民主在国内和国外都变得太经常与债务和功能失调扯上关系。”（第48页）民主陷入危机的观点如今广为流传。但是，这篇文章与我今天演讲的相关性在于《经济学人》杂志所认为的当今民主危机背后的两个原因。

按照该杂志的观点，这两个主要原因是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中国的崛起。金融危机暴露了西方经济与政治体制的根本弱点，从而削弱了曾是西方资产之一的自信。很多人对他们的经济与政治体制已不抱幻想——尤其是当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来挽救银行，随后却在金融家们继续给自己发放高额奖金时无能为力地站在一边的时候。

2008年的金融危机发生在西方民主国家的心脏地带，不难理解这场危机对民主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但是为什么要把中国单独提出来？中国并不是这些评论家们所谓“民主世界”的一份子。中国如何影响了民主？

《经济学人》杂志认为，原因很简单，即中国的经济崛起。我想在此处大篇幅地引用该杂志的原文：

中国共产党打破了民主世界对经济发展的垄断。中国在过去的30年间差不多每十年就将生活水平翻一番。中国精英认为他们的模式——共产党的严格控制加上不懈努力吸收人才进入党的高层——比民主更有效率且更不易出现僵局。政治领导人每十年左右更换一次，由于党对干部的选拔是基于他们完成任务的能力，新鲜的人才供给源源不断。中国的批评者们正当地谴责了政府以各种方式控制公众舆论的行为，从监禁异见人士到审查网络发言。然而自相矛盾的是，对控制的痴迷意味着这个政权正密切关注着公众舆论。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能够解决在民主国家需要花费数十年才能解决的重大国家建设问题。比如说，仅仅在两年内，中国的养老保险就新覆盖了2.4亿农村居民——远远超过了美国公共养老金体系所覆盖的总人数……中国提供了另一种模式。从非洲（卢旺达）到中东（迪拜）再到东南亚（越南）的国家都在认真对待这一建议。（第49页）

还有，“随着中国的影响力增强，美国和欧洲失去了它们作为榜样的号召力和传播民主的欲望……当美国政府甚至连财政预算都无法通过，更别说规划未来的时候，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还要将民主作为理想的政府形式呢？当欧洲的精英们因为民选领导人妨碍了传统财政政策的实施而将他们赶下台时，独裁者们为什么要听从欧洲的民主宣讲呢？”（第51页）

因此，这本杂志的结论是：中国比以往的共产主义更加实实在在地威